

# 新文學革命的前衛運動

龍寶麒

## 國父上李鴻章書的文學成就

### 文學革命與社會革命

「文學革命」的形成，受到許多種複合因素的影響。在意義內涵上，「文學革命」與「文學思潮興替」及「文學創作演變」是不同的。

其差別在於，後二者以文章風格體例的變化為主，例如從六朝的駢體文而演變為唐詩，而宋詞，而元曲，而到明清的散文、小說、戲劇。雖然在寫作技巧上有差別，但，就整個文學發展的過程來看，仍然是循序漸進，先後連貫的。

「文學革命」則不然，它至少包括三方面的變動：一、文學創作體裁上的革命，二、作品思想內涵的革命，三、由於文學革命所帶來的政治、社會、文化的綜合革命。

事實上，「文學革命」與「社會革命」是相輔相成，互為影響。從一方面來說「文學革命」推動了「社會革命」。例如法國大思想家孟德斯鳩（一六八九—一七五五）於一七四八年出版「法意」，盧梭（一七一二—一七七八）於一七六一年出版「社會契約論」，因而促成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運動。傑弗遜在起草「獨立宣言」中，開宗明義揭出：「人生而平等；人生而有其不可剝奪的權利，即為生命，自由與追求幸福。」「為求保障此種權利，人與人之間才有政府的設立

，政府的權力係來自被治者的同意。」「在任何時候，任何一個政府有對上述目標加以破壞時，人民有權改換或廢止這個政府。」因此，美國的獨立運動，事實上就是民主、自由、平等思想孕育下的結果。而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，事實上就是美國獨立運動的延長，發揚到另一個新的高峯。而法國大革命時期所發佈的「人權宣言」，更融合了所有十八世紀最開明、最進步的政治主張，所凝成一篇不朽的歷史文獻，它實際上支配了，領導着全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。

從另一方面來說，英國的工業革命改變了生活的模式與社會的型態，造成資本的集中，城市的興起，勞資的衝突，農村的殘破，舊有制度的崩潰，帶來了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。此外，由於生產過剩，造成市場的爭奪，產生了帝國主義，向外擴張侵略，佔領殖民地，實行資源掠奪，經濟榨取，爆發了民族革命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，各種思想、學說、主義都應運而生，乃是「社會革命」導致「文學革命」的另一型態。

### 中國新文學革命前衛運動的意義

中國的「新文學革命」，是滿清末年在列強瓜分的危機下，所孕育產生的自強變法，實施「

現代化」所推動的社會革命、經濟革命、政治革命下的產物。

一般說來，中國「新文學革命」起源於「白話文運動」。雖然，白話文的使用由來已久，明清以還的小說家已大量的使用口語，而地方上的民俗文學，諸如說書、相聲、鼓詞以及民間歌舞戲劇等，白話的程度與今日的文學作品實相去無幾。然而，「白話文運動」則指一九一七年，在北平的一批從事文學運動的作家，尤其指「新青年」的成員，所提倡的全國普遍採用「白話」作為寫作、教學工具的一場激烈爭論，因為自此以後，白話文才真正的被整個社會所接受。

所謂「中國新文學革命的前衛運動」指的是在白話文運動以前，中國在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下，所實現「現代化」過程中，所引發的社會革命，經濟革命與政治革命，有關各種思想討論的文學作品，即構成了「中國新文學革命的前衛運動」。

國父「上李鴻章書」即為「中國新文學革命的前衛運動」的第一聲禮炮。雖然，在國父「上李鴻章書」之前，即有許多思想家提出「變法自強」的主張。例如林則徐於一八三九年上書道光皇帝，請禁鴉片，提到：「數十年後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，且無可以充餉之銀。」李鴻章於

一八七三年上書同治奏請製造輪船：「士大夫固於章句之學，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，狃於目前苟安，而遂忘前二、三十年之何以創鉅而痛深，後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制外，……」（見李文忠公全集）。一八八七年何啓與何禮垣合著「中國極宜改革政法論」、「新政始基」、「新政變通」、「新政安行」，合稱「新政真詮」，主張開國會，行君主立憲制度。一八九五年，康有為合十八省舉人在北京會商拒約（拒絕馬關條約）

自強，上書論戰守之方及自強之道。為什麼這些作品，筆者並不列入「中國新文學革命的前衛運動」之列？主要的原因是因爲，「中國文學革命」是國父所領導下「民族、民權、民生」或是「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」革命運動下的產物。「中國新文學運動」發生於一九一七年，即民國六年，在中華民國肇造之後，從事「新文學革命」的作家，都是國父革命的信徒，即以當時的左派文人而論，亦不能否認國父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真實意義，因此，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派，自難視爲「中國現代革命」的正統，其作品也排除在「中國新文學革命的前衛運動」的名單之外。充其量，我們可視之爲介於保守集團與革命陣營之間的中間人物，或是「中國新文學革命的前衛運動」的一脈支流。

## 前衛運動的逆流

國父革命運動所遭受最大的阻力，並非來自保守派人士，相反底，却是進步集團的勢力。因爲當時的保守派已爲朝野的有志之士所鄙視，只

是垂死前的掙扎而已，難以發生大的作用。但是進步集團中的某些人士，把革命的發展帶上一條錯誤的道路，乃是造成革命力量分散、失敗的原因。

所謂革命運動的阻撓，即爲短視的「船堅炮利」主義，僅限洋務運動，而非從政治的根本上着手。魏源的海國圖志序：「是書何以作？曰：爲以夷攻夷而作，爲以夷款夷而作；爲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。」

其最足代表者有：

王韜「變法」中云：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知天下事，未有久而不變者也。……自明季利馬竇來中國，始知有東西兩半球，而海外諸國有若棋佈星羅。而今日泰西各大小國，無不通立和約，叩關而求互市，舉海外數十國，悉聚於中國之中，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，幾於六合爲一國，四海爲一家，秦漢以來之天下，至此又一變。嗚呼！至今日而欲辦天下事，必自歐洲始，以歐洲諸大國，爲富強之綱領，制作之樞紐，舍此無以師其長……設我中國至此時而不一變，安能埒於歐洲諸大國？而與之比權量力也哉？然而一變之難難矣，以今日西國之所有，彼悍然不顧者，皆視以爲不屑者也。其言曰：我用我法以治天下，自有聖人之道在，不知道貴乎因時制宜而已，即孔子而生乎今日，其斷不拘泥古昔而不爲變通，有可知也。」

薛福成「變法」中曰：「今天下之變亟矣，竊謂不變之道，宜變今以復古，迭變之法，宜變古以就今。……我國家百集王之成法，其行之而

無弊者，雖萬世不變可也。……若夫西洋諸國，持智力以相競，我中國與之並峙，商政礦務宜籌也，不變則彼富我貧；考工製造宜精也，不變則彼巧而我拙；火輪舟車電報宜興也，不變則彼捷而我遲，約章之利病，使才之優絀，兵制陣法之變法宜講也，不變則彼協而我孤，彼堅而我脆。」

曾國藩：「輪船之速，洋炮之遠，在英法則跨其所獨有，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，若能陸續購買，據爲己物，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，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。」又說：「將來師夷以造砲製船，尤可期永久之利。」「綜觀自強之道，總以修政事，求賢才爲急務；以學作炸炮，學造輪舟等具爲下手工夫。」

李鴻章：「若火器與西方相埒，平中國有餘，敵外國亦無不足，俄羅斯、日本從前不知炮法，國日以弱，自其國之君臣，卑禮下人，求得英法秘巧，槍炮斷能致用，遂與英法爭雄長，中土若於此加意，百年之後，長可自立。」「洋人視火器爲身心性命學已數百年，一旦豁然貫通，參陰陽而配教化，實有指揮如意，從心所欲之快。……鴻章以爲中國欲自強，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，欲學習外國利器，則莫如覓製器之器，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，欲覓製器之器，則或設一科取士，士終身懸以爲富貴功名之鵠的，則業可成，藝可精，而才亦可集。」

日後，李鴻章洋務運動的失敗，實由於他目光所及限於造船、製械、築港、練兵等軍事項目，完全忽略了政治、經濟、教育諸制度的根本改

革。所以梁啓超在「李鴻章傳」中批評他：「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，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務，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，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。」

國父對洋務運動在「上李鴻章書」中早已預言：「富強之本，不在於船堅炮利，壘固兵強。」「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，是舍本而圖末也。」數年之後，竟不幸言中，則國父之真知灼見實在清末諸子之上，因成就的功業亦在諸子之上。梁啓超：「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，不通世界之大勢，不知政治之本原……李鴻章晚年之著著失敗，皆由於是。」乃是洋務運動失敗的最好說明。清末，朝野人士醉心洋務運動，對國父革命的主張，不能接受，招致甲午之戰挫敗之辱，之後，八國聯軍接踵而至，中國人民忍列強無理蹂躪摧殘，割地賠款，國勢每下愈況，民不聊生，豈是偶然？

### 維新運動與中國革命

維新運動就是洋務運動的延長，目的都是變法圖強，只不過是，前者只注重船堅炮利，壘固兵強，後者則以政治制度的改變為富國強民的根本。當時中國駐英公使郭嵩燾說：「西洋立國自有本末，不明此義，則萬事皆無其本，即傾國考求西法，亦無裨益。」

然而維新運動的政治改革，仍局限在政令制度上的變更，對西方文化的精髓沒有作有系統的吸收，並使之在中國生根，則法令的推行，才能得到良好的效果。

康有為於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時期，中舉人試，即聯絡十八省舉人，發起「公車上書」運動，痛陳變法維新之道。翌年，又中進士，當此時也，個人政治前途，如旭日東升。乃把握有利的社會地位及政治情勢，向皇帝實施政治推銷，經過七次的上書，終於獲得寵信。另一方面則抓住士大夫的心理，鼓吹其政治思想，在朝廷中掌握住一部份羣衆，結成維新集團。因為光緒皇帝變法心切，對康有為不次擢升，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，實權則比於宰相。由於他個人的得君行道，政治地位日隆，自然受到一般人的尊重與支持，也吸引了不少想要顯達榮華者的巴結。在康氏發動變法之初，舊黨實採取旁觀的態度，然而，他的新政推行伊始，即着眼駢枝衙門，裁汰冗官，危及此特權階級的個人利益，兩派衝突乃起，冰炭不容。如果康氏變法不損及舊黨私利，則形式迥異，若康氏甚至能以賄賂，則此派人士或投入懷抱，亦未可知。由此觀之，則維新變法實為朝廷之事，與國民無關，局限於少數的智識份子，缺少廣大的人民作為羣衆基礎，是則，維新變法，在先天上，已注定其必然失敗的命運。

其次，就康有為維新變法的目的而言，主要在鞏固滿清帝國搖搖欲墜的政權，在報皇帝知遇之恩，寵錫之惠。維新在基本上是一場宮廷權力的鬭爭，新黨與舊黨的權力之爭，慈禧與光緒的權力之爭。爾後，政變失敗，康有為亡命海外，組織保皇黨，出入言談，以帝師身份，許以重官厚祿，海外華僑爭相禮拜，卑詞厚賂，捐款之數，動輒億萬，實則中飽康氏私囊。而革命黨人，

奔走呼號，犧牲性命，拋頭顱，洒熱血，處境之艱苦，何止千萬倍？卒賴仁人志士不屈不撓之精神，終能推翻滿清，建立民國，真所謂「風雲因而變色，草木為之含悲」，此一部革命的歷史，真乃「驚天地，泣鬼神」，在這一時期，所表現的文學作品，也構成了轟轟烈烈的「中國文學革命的前衛運動」，在中國的文學史上，沒有一個時期能與之相比。

### 中國文學革命前衛運動的發皇

國父「上李鴻章書」在「中國現代文學史」上代表着重大的意義，它第一次揭示把中國推進「現代化」的各種政治遠見，鈎出一幅國家邁向新生、繁榮的藍圖，為「中國現代文學」埋下第一顆種籽。

國父於一八九四年上書李鴻章，較康有為「公車上書」運動尤早。由於國父所提的是根本改革的方法，以全國人民的利益替代滿清皇族的利益，以民主思想的革命運動替代保皇思想的模仿西化，無異是向滿清的權貴宣戰，所以，李鴻章不能接受國父的思想。但國父於「上李鴻章書」後，接觸到清廷領導階層的腐敗，思想的閉塞，知事不可為，乃奮而革命。實則，國父深切了解革命所帶來的各種破壞、戰爭、屠殺，中國人民將忍受一次巨大的災難，付出無比沉痛的代價，國父為免生靈塗炭，於是毅然「上李鴻章書」，痛陳變法圖強大計，怎奈滿清已極度腐敗，積重難返，國父在無限失望之餘，才決

定走上革命的道路，由此可知「上李鴻章書」是中國政治、經濟、社會革命的起點，是中國歷史走向兩個不同方向的分水嶺，它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又是如何的重大？

### 有關上李鴻章書經過的記載

在 國父手著的各種文獻中，從未提及有關「上李鴻章書」的經過，當時的實際情形，由於缺乏當事者的現身說法，實難作一翔實正確之定論，治史者不易採信，以致眾說紛紛，莫衷一是。

例如，國父在「孫文學說」第八章中說：

「……懸壺於澳門、羊城兩地之間，而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，與陸皓東深入武漢，北遊京津，以窺清廷虛實，至甲午中東戰起，以為時機可乘，乃赴檀島、美洲，創立興中會。」國父對上書李鴻章事，隻字不提，是何原因？令人細堪玩味。筆者猜測可能基於下列理由：一、民國雖然成立，但保皇之勢力仍極大，「上李鴻章書」可能給革命黨人造成一種錯誤的想法，以為國父當初有意與舊黨從事政治合作，動搖了同志革命的意志。二、國父為李鴻章之無知痛惜，蓋自上書之時起，至革命成功之日，相距十八年之久，十八年來犧牲無數仁人志士、金錢物質，以及寶貴的時間，造成了長期分崩割據的局面，人民忍受一段漫長的黑暗時期，由戰亂殺伐，流血革命所致，使中國的現代化延後了卅年至半世紀之久！給予日本侵略的大好機會。三、國父偉大寬恕的政治家風度，不念李鴻章之舊惡，不作自

我表揚之功，任憑史學家執春秋之筆下公斷焉。

至於上書的全文，係於 國父逝世後，由顏頡剛在民國前十八年九月至十月的上海萬國公報中發現，經轉載各報刊，則此一被埋藏多年，富有歷史價值的革命文獻，得以重為世人所知。上書的經過則有下列各說法：

一、鄒海濱「中國國民黨黨史」：「甲午中日戰開，總理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，聞北洋大臣李鴻章有與復中國之意，乃由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委員徐秋畦介紹，上書於李，李不納，惟予以農學會籌款護照。」

二、張其昀「黨史概要」：「一八九四年（光緒廿年）中日之戰爆發，總理愛國事，曾上書李鴻章，陳救國大計，由總理同鄉鄭觀應作函介紹於李之幕僚羅豐祿，李託辭不見，但謂俟之異日。」

三、羅家倫「黨史概要」：「一八九四年五月，時偕陸皓東北遊京津，窺清廷虛實，並上書李鴻章，陳救國大計，鴻章不能納。」

四、陸友白「孫文全集外傳」：「一八九三年歲癸巳，與陸皓東北遊京沽，上書李鴻章，陳四大政，復謁於李之私邸，勸其中興，李以年老辭。」

五、吳稚暉「國父年系別傳」：「中日交戰前，先生由湖南出揚子江口，循海道入北京，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，勸李革命。」

六、林百克編「孫中山先生傳」：「先生在檀香山既組興中會，又由郵上書清相李鴻章，勸其革命。」

七、王貽非編「關於 總理上書李鴻章」：「總理在二十八歲時曾上書李鴻章，其說有二：第一說是交郵寄，第二說是親見李鴻章面陳，照推測 總理當時未必遇見李鴻章，故以第一說較為可信。」

八、馮自由「革命開國史」：「由王韜介紹於李鴻章之幕府羅豐祿，而李竟拒絕接見。」

九、陳少白「興中會革命史要」：「先由鄭觀應函托王韜介紹於李之幕府，再介紹見李，該幕府為誰？李是否接見？皆未提起。」

十、胡去非「孫中山先生傳」：「先生在檀香山既組織興中會，又由郵上書李鴻章。」

十一、半粟「中山出世後中國六十年大事記」：「是年孫文二十九歲，以中日戰爭，時機可乘，乃赴美檀香山，創立興中會……孫文放洋後，又郵上李鴻章一書，書全文見本年九、十兩月之上海萬國公報。」

十二、謝君韜「總理革命史話」：「……係在廣州醫館中所手草，稿畢請黃詠襄就正於寓居滬濱之王韜，王乃介紹於李鴻章之幕賓羅豐祿，進見李鴻章暢論建國圖強之四大要政，（人盡其材，地盡其利，物盡其用，貨暢其流。）從上午八時直談至下午四時……」

十三、楊銳「中國近代革命史」：「黃季陸先生說：『是由香港總督促成 總理和李見面，宮崎寅藏在廣州也參與其事，後來李鴻章忽然變卦，避不見面，只有請李的秘書轉遞。 總理逝世後，顏頡剛從宮廷舊檔案中找出一份萬國公報，重在全國各報刊發表。』」

同書：「歐美歷史學專家如湯恩比·哈威等正不惜以何方法求其真象，渠等認為孫逸仙先生當時敢於上書李鴻章，確係為人所不敢為；李鴻章允發籌款護照，則係贊成革命，拒絕接見，則係反對革命，此兩者在歷史學者之筆下，只能擇其一，而不能同時並存。」

十四、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於民國二十一年出版「總理年譜長編初稿」所書，係函介於李鴻章幕友徐秋畦，（徐為清總理衙門委員）。

十五、羅隱柔「中華民國國父實錄初稿」：「十六日（？）自故里返廣州，與陳少白言上書李鴻章事。」

國父返里後，廣州與石岐之藥房無人主持，店夥以告陳少白，陳少白乃代為照料。是日（案：是日不知何月）國父自故里返廣州，乃與陳少白言擬上書李鴻章，並出書稿示陳少白，囑文飾之。

### 自廣州抵上海，見鄭觀應，並由鄭介識王韜

國父與陳少白相晤後，旋即由香港赴上海見鄭觀應，請介見李鴻章。

鄭觀應字陶齋，與國父同籍香山，原習儒業，官至三品銜候補道。英、法聯軍戰役失敗後，始棄儒就商，學習西文語言，頗留意外國政治實業，首倡振興中國棉業，創辦上海織布廠。光緒八年，李鴻章奏以鄭專任商務，後任招商局總辦。中、法戰起，彭玉麟督辦廣東防務，命鄭至南洋各地，考察僑務，平日倡言新政，為人所重。國父以鄭為鄉前輩，知鄭與李鴻章夙有淵源

，故求介見。並出示上李鴻章書稿求正於鄭，鄭與王韜共潤色之。王字紫銓，號天南逐叟。太平天國時，曾上書陳覆清之策，不能用，因不容於清吏，走香港，與友人英國漢學家雅格博士 Dr. Jacob (時在中國任英領事) 同赴英國，助譯四書五經。後返香港，任循環日報主筆。時在上海，甚負時名，與鄭觀應時有往返。

國父因以鄭之介識王韜。王以國父英年志切救

國，深重之，因與鄭同潤色上李鴻章書。  
（六月）時中、日為朝鮮內亂，互相派兵，戰禍一觸即發，中外矚目，國父亟欲北上，一窺清廷虛實，由王韜函介於李鴻章幕僚羅豐祿。國父乃偕陸皓東北上抵天津，先訪羅，又得徐秋畦為先客，求見李鴻章，先以書進。  
惟其時李鴻章一身當軍事外交之衝，對日派兵及交涉，正應接不暇，迄未接談。」（未完）

中外文庫  
之二十二

# 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著

定價新臺幣伍拾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  
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本書評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彭玉麐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曾紀澤、張曜、蔣益澧、陳國瑞、程學啟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張樹聲、郭松林、聶士成、吳棠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李慈銘、洪鈞、張佩綸、張之洞、袁昶、翁同龢、陳寶箴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闕、楊守敬、于式枚、梁鼎芬、詹天佑、王闓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林紓、嚴復、陳衍、辜鴻生、鄭孝胥、樊增祥、易順鼎、陳漢章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黃侃、趙熙、朱祖謀、王國維、吳梅、楊圻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